
香港中文教学 和普通话教学 论集

田小琳 著



H19-53

7.58

香港中文教学 和 普通话教学 论集

田小琳 著

人民教育出版社



(京)新登字 11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香港中文教学和普通话教学论集/田小琳著. —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97
ISBN 7-107-12085-9

I. 香… I. 田… III. ①汉语-语言教学-教学研究-香港-文集 ②普通话-语言教学-教学研究-香港-文集 IV. H19-53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06702 号

香港中文教学和普通话教学论集

田小琳 著

*

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100009 北京沙滩后街 55 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华云电子数据中心照排

北京民族印刷厂印装

*

开本 880×1230 1/32 印张 13.625 插页 2 字数 320 000

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 3 001—5 780

ISBN 7-107-12085-9

G·5195 定价 21.60 元
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厂联系调换。

序

张志公

由于汉语言和文字的特点，中文教学本来就有它特定的困难。有些问题一直到今天还在争论之中。而香港由于历史的原因，又给这本来就有困难的中文教学，增加了额外的困难。

所谓历史的原因，大家都知道，指的是香港被老牌殖民者大英帝国武力战败了腐朽的满清政府，以不平等条约强行霸占，英国对香港实行殖民统治。我们知道，殖民者以武力强行攻占某一国家、某一民族的地盘，一般情况下，被侵占的民族都是世代代生于此、长于此的；相对地说，在被侵占的当时，他们的文化落后于侵占者。所以，殖民者很快就对被占领地实行全盘侵略，包括语言在内。迫使被征服者学习、使用侵略者的语言（包括口头和书面），并以之为正式官方语言。而香港这个地方则不然，香港有它特殊的地方。那里的居民，无论是鸦片战争前，还是鸦片战争后，大都不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，而是从大陆迁去的广东人、福建人，总而言之是中国人。最早去的，不用说带去了中国的封建文化，包括古代汉语；就是比较晚去的，也是在晚清时代。他们带去的有封建主义落后的东西，又有古老文化光辉的一面。总的看，他们的文化虽然在有的方面落后

于殖民者，但在若干方面和总体方面又高于殖民者。他们不可能让香港全部被侵略者化，包括语言。这里显示了中华民族的特点，也显示了文化力量之伟大。

由于历史的原因，由于在香港的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状况，香港语文出现了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，就是多种因素杂糅。有汉语文文化的古今杂糅，有汉语的粤方言和普通话（国语）的杂糅，有英文和中文的杂糅。而这三种杂糅，不是分头各糅各的，而是混杂地糅在一起，结果糅成了一种——抱歉，在这里我实在想不出雅一点的话来说——“四不像”语文。有的时候，分不清这是哪里来的。比如“此处不许泊车”。请教了几位香港学人，“泊车”是什么意思？哪里来的？有的回答我说，“泊”是英文的音译，英语“停车”说 to park，“不许停车”说 “No parking”，“park”译成“泊”。有的告诉我说，这是古代语言的遗留，就是“泊船瓜州”的“泊”，“泊车”是从“泊船”来的。这个例子就是古今中外杂糅在一起，来历说不清楚了。要举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。这种杂糅造成的“四不像”语文，在国际上少有，说直爽一点儿，这是一种落后的现象。

我们说要加强中文教学，提高下一代人的语言文字能力，也就是听说读写的能力。我多次到香港，接触过香港的中小学教师和学生；在大陆也接触过来旅游的香港教师和学生，我发现——请容我坦率地说——他们这四种能力都不够用，更坦率一点儿说，都不合格。有一次，在庐山，遇见几位年轻人，一眼看上去就能判断是来自香港的。他们站在山边上，东张西望，很明显想找一个能说广东话的人，谈谈天，问些什么，但是找不到。我只会说三言两语的粤语，就大着胆子迎上去了。我用广东话对他们说“早晨！”（早！）我接着问“边度嚟㗎？”（从哪儿来？）他们一听高兴极了，马上和我亲热起来。但可惜我就只会说那么一点打招呼的话，再用广东话应对下去，我就不行了；我改说普通话，他们几乎完全不能对答，比我

的广东话还差。我一看他们普通话不行，估量英语可以对付吧，我改说英语。原来他们听说英语的能力比我预料的还要差。我们只好夹七杂八以三种语言谈话，三种话杂糅，谈了一个多小时，他们非常高兴。这里插一句闲话，学语言要“胆大皮厚”，只要敢说，最低限度可以起到打破沉默的僵局，缩短距离的作用。

上面说的是口头上的听说，写文章也一样，报刊文章，看两句就知道是香港报纸。有一次，我和内地几位学者一起去香港参加学术讨论会，一到就遇见我的一个学生。他说“你们来港，报纸上昨天就卖了”（意即报道了），亏得我早年到过香港，否则以为把我们卖了。这种话也经常出现在报刊上，书面语也经常用这种“四不像”语言。可以说，在语言方面包括文章，已经形成了一种香港风格，用大白话说，形成了一种香港调调儿。这并不奇怪，大陆上各地的人到香港去，香港人已经听到各种不同调调的方言。每种语言包括方言，除了语音、词汇、语法的区别之外，都有一种特殊的调调、风格，有的高音用得特别多，有的低音多，有的爱拉长声，香港人爱说“咩！”一听就是香港调调。香港的中文教学，应该研究如何对付“四不像”语言的问题，“四不像”语言不规范，不标准，在现代社会的交际中，效率是低的，交流的信息量是差的，不符合现代化、科学化、信息化的需要。可惜，没有在教学中做到，大概想到这个问题的人也不太多，包括做教育工作的人。

时代不同了，语言文字的重要性空前大起来，原因是我们进入了信息社会。现在，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，几乎可以说，第一位是信息的竞争。军事上谁的信息快谁就能赢，信息慢的就要挨打。做生意信息快了解行情，了解供求情况就赚钱，否则就赔本。而信息的交流，归根到底要靠语言文字，不论声传技术多么发达，最根本的还是语言文字，那些技术是靠语言文字符号化的。现在常听人议论说，大国首脑之间有热线，有时说几句话可能决定世界

命运。即便说几句话决定问题，最后还是要用白纸黑字记录下来，成为历史文献。他们要对全世界、全人类和后代负责。单凭所谓“音档”是不够的。何况任何语言都有只凭声音听不出是什么字呢！就像“泊”，写出来可以猜；只说“泊车”，听不懂，猜不出。因此，我一向认为，在今后大力改进香港的中文教学，提高效率，尽快提高香港全社会的中文水平是一件非常迫切的事情。香港是经济十分发达的地区，语言文字和生产发生着直接关系。目前都在研究用自然语言指挥电脑，向电脑发出指令，要它为我们工作，可见语言和生产的关系。先进国家的高科技一日千里，香港也不能落后。香港未来经济的发展对中文教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，用原来传统的观点谈中文教学远远不够了，中文教学要适应即将到来的极复杂的社会变化、社会生活和工作。

在文章开始谈到的香港的一些历史社会原因，这种现象怎么对待，因为篇幅的关系，这里不展开讨论。下面我只想谈两个问题。

第一个问题。几年来，从不止一两两位香港的英文专家（多数是英国人）那里听到，他们说，1997年7月以后，香港的第一语言仍是英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英语是世界上最优秀最美好的语言。何以见得？因为使用英语的地域最广、人最多。我认为，很需要冷静地科学地对待这个问题。的确，到现在为止，世界上会说英语的人很多，会英语到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行得通。为什么？是因为英语比所有语言都更优秀吗？我直截了当地说：错了！语言应用的消长和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关系极为密切。在若干个世纪前，世界上没多少人会英语，而汉语言文字已经为东太平洋、东南亚甚至为全世界服务了。那时，丝绸之路上做生意，都得说别国语，不用汉语？这可能吗？语言是交互影响的，各民族要互相学习，我们要学各种外语，外国人也学中国的语言文字。那时，中国的文化先进，中国的语言文字已经在世界上为政治、为商业交流服务了。如果说，英语在香港用的人多，是因为英语优秀，那不妨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

的情况。那时，日本侵略者占领香港，英语在香港还吃香吗？日语变成了“最优秀的语言”，香港人和东南亚各国人都被迫学习日语。直到今天，还留有痕迹。能不能认为英语一夜之间就由“最优秀的语言”变为“最低下的语言”了呢？语言作为交际工具，没有优秀和低下之分。

如果认为在1997年7月1日以后，在香港第一语言仍然是英语，那是错误的，也是不可能的。因为香港回归祖国以后，将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，它不可能不在这个整体保持统一的语言。一个国家的统一，一定要有语言的统一。我希望读者朋友们冷静、科学地考虑这个问题。当然，一百多年来香港使用英语作为正式语文，立刻停止使用英语，是不现实，也是不必要的。香港回归后，实行一国两制，《基本法》也规定了除使用中文外，英文仍然是正式语文，有法律条文保证，并没有在香港强制停止使用英语。我们国家没有采取一种霸道的做法。现在世界上有很多汉学家，很多地方有“汉语热”，我们并没有像好几个老牌殖民主义者那样强迫别人学我们的语文。他们要学，都是自发的。总起来看，既不要认为英语在香港永远是第一位的，也不要认为英语要在香港即刻废止。这些都不是科学的态度。

第二个问题。想说说普通话和中文教学的关系。据我了解，不仅在香港，就连广东、广西也同样有人特别是教中文的教师，不愿意学普通话，愿意说粤语。常常有人批评他们这种态度。我想不要简单地批评他们，他们大多数人是出于好意。他们认为，我们祖祖辈辈说粤语，用粤语可以充分表达思想感情，学生理解起来也容易。改用普通话教课，说起来结结巴巴，听起来难听，学生不容易理解所讲的内容，甚至听不懂。所以，还是得用粤语上课，不用普通话。这个推理当然站不住。比如教英语，不论教师自己英语说得怎么样，也要能用英语讲课，否则学生毕业还学不好，不能听英语，不能说英语。这是很清楚的。不过教师毕竟是从教学效果考虑问题的。只

能用理论和实践来开导，不能只靠批评。

顺便说说繁体字和简体字问题。香港用繁体字，没有用简体字。有人说，我们世代代用繁体字，忽然改用简体字，那不是要变成文盲了？而且举了一个例子，说一个老先生叫孩子到书架上找《後漢書》，孩子只认得简体字的《后汉书》，三个字都简化了，所以连书也找不到了。这是夸大其词，要想把任何事情夸大都可以举出个极端化的例子。其实没有这么难。有的语言文字工作者在美国的华裔子弟中调查过，孩子们喜欢简体字。倒是有些学繁体字用繁体字出身的学问家，不赞成用简体字，理由之一是汉字是艺术品，一简化，艺术性就没有了。其实，如果问一个文盲，“一”难看吗？“人”不美吗？就连书法家恐怕也不一定非把“一去二三里”写成“壹去貳叁里”才能写出他的书法才能。我们要为初学识字的人着想，反对用简化字不是初识字的人的感觉。从学习者、教学者难易角度考虑才是最重要的。还要说明的是，我们并不是把通用的汉字都简化了，简化字并不是大批的，更不是所有的，简化的多是十二画以上的部分常用字，罕用字不简，为数也不多。

再说回来。说粤语说习惯了，就说普通话太难学，那就不客观了。实际上，比起中国各地的方言来，普通话是最容易学的。它的语音系统简易，音素、音节数目少，四百多个音节乘以四个声调，也不过一千三四百个音节，难发的音没有，像法语的小舌音那么难发的音，普通话里没有。普通话有翘舌音，zh ch sh r，把舌尖往上一翘就发出来了。另外香港人觉得很难发的“儿化韵”，也逐渐在减少，很多是可儿化可不儿化的，比如“星期日请到我家来玩儿”，你说成“到我家来玩”，也没有问题，也是可以的。儿化韵用得更多的是四川话，比普通话用得更多。我家住的地方离中国美术馆很近，过去我常在美术馆一带散散步，一次一位年轻人走过来，用浓重的四川口音问我：“老大伯，美术馆儿哪个走法？”北京人不说“美术馆儿”，只说“美术馆”，不儿

化。博物馆、展览馆，都不儿化。只有说“下饭馆儿”“下酒馆儿”“坐茶馆儿”才儿化。普通话中的必读儿化词量并不很大，除了这个音难发一点，稍微特殊以外，没有什么难发的音。

汉语语音的难点是声调。汉语是声调语言，声调起区别意义的作用，掌握声调的抑扬起伏，升降高低不容易。一个人说话，如果声调对，音发得错一点，不妨碍交际。你到商店买茶杯，把chá bēi，说成cá bēi，没什么问题，要是说成chǎ bèi，chǎ béi，就都听不明白了，会感到可笑。外国人学汉语、方言地区人学普通话，声调是最难的。就是说甲方言的人要学乙方言，也以声调为难点，粤语有七八个、九个、十个声调，比普通话的四个要多，粤语有平上去声，还有入声。说粤语的人能辨、能说这么复杂的声调，学那么简单的只有四个声调的普通话，比说普通话的人学粤语容易多了。

第二个难点是语汇难。汉语语汇没有形态变化的约束，组合容易。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基础，吸收了粤方言部分语汇，也吸收了各地方言用语，容量大，学起来容易，因此才成为“普通”话。对普通话和粤语的关系，要冷静客观地看，不能夹杂主观好恶，也不能没有原则。任何方言都不能和普通话半斤八两地看。要尊重实际，不能硬性规定，在1997年7月1日以后，香港人即刻都改说普通话，否则炒鱿鱼，那是不对的。香港大多数人祖祖辈辈说粤语，不能一天就改说普通话。香港人说普通话难学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，要理解。我举个例子，有位朋友是山东人，他在北京念中学、大学，后来当教师、校长；以后到过西北、东北，又回到北京，但是一直到老他的山东话也没改，他总是把“白(bái)的”，说成“bái的”，把“出去了，还没(méi)回来”，说成“出去了还mù回来”。真可谓“乡音无改鬓毛衰”了。

因此，我们在全国也是说“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”，注意，写到《宪法》里用的是“推广”一词，并不是立即强制实行。但是，一个统

一的国家一定要有标准语，这是世界通例。每个国家都有方言，英国的方言并不少，但是只以伦敦话（过去叫 king's English）为标准英语。

总之，在香港对于处理普通话和粤方言的关系要持冷静的态度。一是不能听之任之，要积极推广普通话，要力求在较短时间内，在公开的交际场合基本上能用普通话，至于在家里，你愿意用什么语言都可以。二是不要急躁，欲速则不达，急躁、不冷静，会走向反面，反而误事。正确的事做过了一步就变成荒谬。

田小琳教授在内地从事古代汉语、现代汉语的研究工作、教学工作，从事现代汉语教材、书刊编辑工作，这方面颇有造诣，有著述。到香港继续教学和研究，在工作负担很重的情况下，将教学和研究进一步深化，发表过不少论文，不一一评说。她到香港后，接触粤语上十年，在推广普通话和中文教育方面，又做了很多工作，接触了许多方面的人，可以说，对教学有相当广泛深透的了解。她个人从学习、研究古代汉语，转而研究现代汉语，古今粤普能串连起来研究，她是谈论此中问题的适当的专家。这本书，我相信对说粤语的人如何提高中文水平，包括书面语和口语，以至对说普通话的人如何对待粤语，都会有相当帮助。

小琳的书成发稿，正在香港即将回归祖国之际，她要我说几句话，借此机会谈谈我对香港语言问题的一些看法，以就正于广大读者，即以此代序。

1997年2月于北京

综 论

21 世纪香港中文教育展望

从宏观世界看，我们已经处在 20 世纪的末叶，望见了 21 世纪的曙光。在这新旧世纪交替的时期，香港也正处在一个世人瞩目的变动时刻。由中英两国政府于 1984 年签订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就要付诸实现，即从 1997 年 7 月 1 日起，英国将香港交还给中国，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。7 月 1 日以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、港人治港。特区的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已经推委会选举当选。后过渡期留下了一个尾声。

香港是创造奇迹的地方，香港人拼搏向上的精神被誉为香港精神。具有极强应变能力的香港 600 多万市民，也都期盼着 21 世纪香港的空前繁荣和安定。董建华先生在竞选的时候公布的政纲就是“共同建设 21 世纪的香港”。我们相信，到了 21 世纪，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，将继续保持它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，仍然是国际金融中心、国际贸易中心、国际资讯中心、国际交通中心。同时我们也希望香港成为中国、东南亚以至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，不断培养杰出人才，为香港服务，为中国和世界做出贡献。长远地看，不保持教育的优先、领先地位，在下个世纪的激烈竞争中，很难保持住一个地区的持续领先地位。

在教育中，首先是基础教育，也就是中小学教育。以香港的学生来说，从六岁进入小学，到中三毕业，或到中五毕业、预科毕业，

都应该是从不同程度上达到了心智较成熟的阶段，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技能，有自学和独立思考的能力，无论就业或者升学深造，都打下了基础。进入大学的学生，如果基础教育水准高，继续得到大学教师的指导，会如虎添翼；如果基础教育水准低，大学还要浪费人力财力替基础教育补课，直接影响了高等教育的素质。

在基础教育中，语文教育又是基础。香港的语文教育一向分英文和中文两种。近年多项调查都指出，大学毕业生的语文水平滑落，引起社会人士的关注和批评。进一步追究原因，其一是大学录取了“英语运用科”和“中国语文及文化科”不及格的学生入学，以至引起了语文未达标准而获录取的大学生政府不予资助的讨论。从这个问题可以得到共识，语文是学习各科的基础工具，亦是工作后须臾不可少的工具，基础教育要给学生打好语文教育的底子，已是社会的需求，是刻不容缓的事。

本文只就语文教育中的中文教育进行讨论。我们希望到 21 世纪，通过基础中文教育，培养学生具有合格的中文能力，他们如升入大学，不论哪门学科，均能以中文为语言文字工具进行有效地学习和研究；他们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，口语表达能应对各种不同场合的交际，且作到得体，表述自己的思想可以出口成章；他们会写一手漂亮的汉字，繁简皆通，文章则通顺流畅，辞能达意；聆听和阅读能力速度快又理解得通透明白。他们能熟练运用中文电脑。他们通过中文了解、学习并继承发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，吸取精髓，指导自己为人做事。到社会上就业的中学生，也一样符合行业对他们语文能力的要求。到那时，社会舆论会一致赞扬学生们的中文程度较 20 世纪有了很大的提高。不仅如此，中文作为第一语文的水准提高，也促进了英文水准的提高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。

基础教育为大学和社会输送了中文能力合格以至良好的学生，达到了中文教育的目标。这个理想是可以实现的，经过政府部门和

语文教育工作者的通力合作是可以实现的,这蓝图并不是海市蜃楼。为什么这样说呢?最重要的条件是,在香港上自政府部门下至中小学教师,有一批各司其职、尽心尽力的精英人才,有一批肯为推动中文教育献身的教育工作者。在中文教育界,我认识不少朋友,包括教育署的公务员,大学和教育学院的讲师、教授,中小学校的校长、中文科主任、老师,中文学术社团的理事,出版社的中文编辑、编审,他们敬业乐业,不断进行研讨和革新,调查研究,调整政策和课程设置;中小学教师在工作负担下仍然坚持进修;中文教育的发烧友们组织学术团体,推动香港以及国际性的中文教育交流。每年都不间断地召开各种形式的研讨会,出版一本本论文集。应该说,香港中文教育工作者的这种精神,也是香港精神的反映。有这个前提,我们便可以绘制 21 世纪香港中文教育的美好远景。

因此,展望 21 世纪的香港中文教育,我们可以充满信心。

我们期望,香港政府,特别寄希望于香港特区政府,会以教育为先,教育为本,投入较大的资源,尤其对基础教育投入较大的资源。目前,教育经费只占全民生产总额的 3%左右,所占的比例不仅低于一些发达国家,而且低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,很多国家在教育上投资占 4%~5%,甚至更高。这种情况和经济发达的香港社会不相称。董建华先生前不久和科技界人士座谈,他已经了解到各界人士都提出要重视教育,他表示理解大家的意见,并一连说了三个要“重视,重视,重视”。作为政府重视教育,最重要的表现是加大资源的投资。以中小学的中文教育来说,不加大投资确实难以改善。一位中学的中文教师,每周课时在 30 课时左右,兼教几个年级中文,多数还兼其它科,课后要批改作业、作文,参加并组织学生的活动,教育落后的学生,和家长见面等等,回到家里疲惫不堪,睡眠不足,他们哪还有时间去读书、教研、科研来提高自己的中文和中文教学水平?这个问题政府部门似乎视而不见,如果不加大投资,增多中

文教师人数，社会如何再对中文教师的水准提出责问？

我们期望，教育及人力统筹司、教育署、教育统筹委员会等作为制定政策的指挥机构，能充分重视在 1997 年 7 月以后，中文地位的上升，在特区的行政机关、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，中文是首要的正式语文，这是国家主权的象征；英文也是正式语文，这是“一国两制”政策的贯彻，也是尊重历史和现实的表现。中文教育的素质要大大提高才能适应语文政策的重大变化。教育统筹委员会自 1984 年的第一号报告书里，就提出了培训更多中文语言教师，在中学推广以中文为教学语言。此后，在 1986 年、1988 年、1990 年、1992 年、1995 年分别发表了第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号报告书，不断就教学语言和中文教育提出建议，第六号报告书更是以“提高语文能力——整体策略”为专题。1993 年 10 月，教育统筹委员会成立语文能力工作小组，研究教学语言问题，并于 1994 年 7 月发表报告书，提出多项改善建议。此报告为第六号报告书制定整体策略做了不少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。教育领导部门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，由此可见一斑。我们相信，它们会为 21 世纪的香港中文教育制定出明确的政策，并进一步部署科学研究工作，在科研成果的指导下，系统地改进、完善课程设置、教材编写、教学方法、教师培训等各项工作。

我们期望，中文教育工作者能一如既往地推动香港的中文教育，利用传媒使社会各界重视中文的使用，在中小学进行教学研究活动，发挥优质中文学校、优质中文教师的带头作用，培养学生热爱中文的兴趣，提高他们自学中文的能力。新的世纪中，一定会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中文教师和一批中文优秀的高才生。他们的教学经验和学习心得会对整体的中文教育产生很大的影响。